

청주대학교
경제통상학과

연도 및 학기: 2026년 1학기

과 목 명 : 경제발전론

과 제 제목 : 공공 교육 지출이 가계 소비 구조에 미치는 영향 연구:
성급 패널 데이터를 기반으로 한 실증 분석

학생이름: 채홍

학번: 2025021848

제출일: 2026년 6월 8일

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1. 引言

公共教育支出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乎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深刻影响着居民家庭的消费决策与消费结构。本文基于公共产品理论、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居民消费理论及消费结构理论，构建了“公共教育支出→居民教育消费→居民其他消费”的两步传导分析框架，利用 1996—2024 年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和 2007—2023 年 31 个省份的城乡面板数据，采用协整分析、VAR 模型、脉冲响应、方差分解及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考察了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教育消费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人均公共教育财政支出每增加 1%，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减少约 0.682%，而居民收入每增加 1%仅带来 0.201%的教育消费增长。第二，教育消费对各类支出的影响具有城乡异质性：在城镇居民中，教育支出显著压缩了衣着和家庭设备用品方面的消费，同时促进了交通通信和其他用品支出；农村居民教育消费同样挤占家庭设备用品支出，但对食品、衣着和交通通信支出均呈现正向促进作用。第三，教育消费对生存型消费的抑制作用正在减弱，但家庭设备等弹性消费品仍被明显挤占，且农村居民教育消费对交通通信的拉动效应显著强于城镇居民，折射出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带来的隐性成本。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持续加大公共教育投入、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实施差异化教育补贴、分区域扩大义务教育范围、完善农村养老保障等政策建议，以减轻居民教育负担，释放消费潜力，促进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

关键词：公共教育支出；居民消费结构；挤出效应；替代效应；省际面板数据

1.1 研究背景

居民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引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但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的问题始终是学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据东亚银行研究报告，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从2010年的不足35%持续攀升，2022年达到37.8%，2025年进一步上升至40.1%。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居民消费占比均值约为58%，与中国仍存在约18个百分点的差距。这表明，尽管居民消费在持续增长，但距离发达国家水平仍有显著距离。

在居民消费支出结构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教育消费支出的高速增长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9476元，其中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达到3489元，同比增长9.4%，远高于人均消费支出4.4%的总体增速，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上升至11.8%。城乡差异同样值得关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5869元，增长3.8%，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0259元，增长5.1%，两者之间约1.77倍的差距提示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异质性特征。从消费结构来看，食品烟酒支出占比已降至29.3%，恩格尔系数进一步下降，居民消费正在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转型。

在中国，教育财政投入的制度安排经历了从“不低于4%”到“高于4%”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出台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首次提出“健全教育战略性投入机制”，并要求“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于4%”。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5年6月披露的数据，当年全国教育支出预算安排接近4.5万亿元，增长6.1%。从更长时段来看，“十四五”时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支出20.5万亿元，占全部民生支出总额的近五分之一，比“十三五”时期增长27.7%；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预计突破25万亿元，较“十三五”时期增长约38%，占GDP比重连续十余年稳定在4%以上。

然而，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审视，4%的投入目标事实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时确立的。截至2025年，中国人均GDP已跨越一万三千美元门槛，但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却长期维持在4%左右，未能实现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提升。公共教育支出的相对不足使得教育成本向居民端传导，这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尤为突出。依据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在高中及高等教育阶段，教育产品具备较为明显的私人产品属性。当前主要通过国家和个人共同负担的方式运行。当公共教育投入无法完全覆盖教育需求时，居民不得通过自有储蓄承担更高的教育开支，从而对居民的储蓄动机和消费能力产生系统性影响。

基于上述现实，本研究拟采用2007—202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系统考察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机制。重点关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公共教育支出如何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支出；第二，居民教育消费支出的变动会经由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以何种方式传导至其他消费类别？第三，上述影响在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异质性。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以期优化财政教育支出结构、缩小消费不平等、提升居民消费率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1.2 研究意义

本研究立足于公共教育支出与居民消费结构的互动关系，综合运用公共产品理论、教育成本分担理论、消费理论及消费结构理论，基于1996—2024年时间序列数据和2007—2023年省级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教育消费的挤出效应以及居民教育消费对各类消费支出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研究成果不仅在理论层面有所拓展，也在现实政策层面具有明确的指导价值。

1.2.1 理论意义

第一，丰富了公共教育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的分析框架。既有研究多将居民消费作为一个总量变量加以考察，或仅关注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总量的影响，较少深入到消费结构内部探究不同消费类别所受的差异化冲击。本文将消费结构细分为食品、衣着、家庭设备、交通通信、医疗保健及其他用品等多个维度，构建了“公共教育支出→居民教育消费→居民其他消费”的两步传导分析框架，揭示了公共教育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完整传导链条，弥补了现有文献在消费结构层面的分析不足。

第二，拓展了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在消费经济学领域的应用边界。在传统上，教育成本分担理论所关注的核心，正是政府与家庭之间如何合理分配教育经费。较少讨论这种分担结构对家庭消费决策的衍生影响。本文将教育成本分担理论从教育财政领域延伸至消费行为分析，揭示了非义务教育阶段成本向居民转移后，如何通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改变家庭的消费支出结构。这一理论延伸有助于更全面地评估教育财政政策的福利效应，推动教育经济学与消费经济学的交叉融合。

第三，深化了对城乡二元结构下教育消费异质性影响的认识。现有研究大多默认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教育消费对其他消费的影响上具有同质性，本文通过分样本回归发现，城镇居民教育消费对食品消费影响不显著而对衣着消费具有负向影响，农村居民教育消费对食品和衣着均呈现显著正向影响——这一对比揭示了城乡居民处于不同消费阶段的事实。这一发现为消费结构理论中的“需求层次演进”提供了来自教育消费维度的经验证据，丰富了转型经济体消费行为研究的理论内涵。

1.2.2 现实意义

第一，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教育投入效率提供了经验依据。本文实证发现，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教育消费的挤出效应远强于收入增长对教育消费的拉动效应，这意味着增加公共教育投入是减轻居民教育负担最直接有效的手段。这一结论为政府调整财政支出方向、将更多财力向教育领域倾斜提供了量化支撑，有助于改变长期以来“重经济建设、轻民生投入”的支出格局。

第二，为缓解居民消费不足、扩大内需提供了政策切入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居民消费率偏低是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本文研究表明，教育支出挤占了家庭设备用品等弹性消费品支出，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家庭设备消费受到挤压的现象更为突出。

这意味着，通过增加公共教育投入降低家庭教育支出，可以直接释放被挤占的消费潜力，促进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从而为扩大内需注入动力。本研究的政策建议——加大教育投入、优化资源配置、扩大义务教育范围等——均具有明确的促消费导向。

第三，为推进教育公平与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量化依据。实证显示，农村居民教育消费对交通通信的拉动系数显著大于城镇居民，这反映了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所导致的农村学生异地求学成本。这一发现为教育精准扶贫和乡村教育振兴政策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数据支撑：改善农村办学条件、缩小城乡教育质量差距，不仅关乎教育公平本身，也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隐性教育负担，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第四，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代际消费平衡提供了新视角。农村老年抚养比与多项消费支出的负向关联表明，养老保障不足加剧了家庭内部代际资源竞争——子女教育支出挤占了老年人的消费空间。这一发现提示，教育政策与养老政策需要协同设计，不能孤立推进。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不仅是对老年人的基本保障，也是间接减轻家庭教育负担、释放家庭消费潜力的重要途径。本研究为构建“教育—养老”联动政策框架提供了经验证据。

2. 研究现状

2.1 国外研究现状

在中国学术界，针对公共教育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大致可以从总量效应、结构效应与区域异质性三个层面加以梳理。

从总量效应的角度，部分研究支持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张治觉与吴定玉（2007）将政府支出划分为三类，将教育划入民生性支出，研究发现教育类民生性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均产生了挤入效应。易行健、刘胜与杨碧云（2013）利用1996—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占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增加民生性财政支出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费。贺俊、刘亮亮与张玉娟（2016）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认为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入效应。此外，空间计量角度的研究还发现，教育支出不仅对本地区居民消费产生直接影响，还可能通过空间溢出效应间接影响邻近地区的居民消费。

与此同时，也有研究得出相反结论。李广泳与邸玉娜（2012）以1998年前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及住房等政策改革为分界点，采用分位数回归技术分析了公共开支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公共教育开支在改革后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大于改革之前。杨汝岱与陈斌开（2009）利用城乡家庭与个人调查数据，发现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实施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了12%，表明教育成本上升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从时间演进的角度来看，1998—2013年间政府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不同时间阶段的效应存在差异。

从结构效应的角度，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公共教育支出影响的细致机制。涂立桥（2015）利用我国2000—2012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经济区域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教育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除个别省份

外，财政教育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而在西部地区，财政教育支出对绝大多数省份的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这一研究表明，财政教育支出的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政策制定需要根据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因地制宜。

在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方面，李正旺、胡齐轩与王晨阳（2024）利用中国 2005—2021 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财政教育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均财政教育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财政教育支出的增加会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但研究同时指出，这一效应在较发达地区并不显著，说明发达地区可能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此外，民生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效应在教育文化娱乐等发展享受型消费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对以衣食住等生存型消费的挤入程度相对较低。

在微观影响机制层面，梁晓青（2020）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教育支出对家庭日常消费、核心消费和边际消费的挤出效应，并比较了这种挤出效应的阶层差异和城乡差异。研究发现：第一，教育支出对不同类型消费的挤压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日常消费、核心消费和边际消费；第二，低收入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的日常消费受教育支出挤压程度更高，而高收入家庭的核心消费和边际消费受挤压程度更高；第三，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对日常消费的挤出效应大于城市居民，而城市居民教育支出对核心消费的挤出效应大于农村居民。

国外学术界对公共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的探讨由来已久，围绕二者之间的替代效应与互补效应的争论持续了近半个世纪。Bailey（1971）最早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替代关系，提出政府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可以部分替代居民私人消费，政府支出的增加会降低居民的边际效用。这一开创性理论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本框架。此后，Kormendi（1983）和 Aschauer（1985）进一步将生命周期假说与持久收入假说纳入分析框架，利用美国时间序列数据发现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存在弱替代效应，但并未形成定论。

随着计量方法的完善，学者们开始关注公共支出结构的异质性对居民消费的差异化影响。Fiorito 与 Kollintzas（2004）将政府消费支出划分为公共品和有益品两类，考察了欧洲 12 个国家的经验数据，结果表明政府对教育、医疗等有益品的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这一发现显著推动了研究视角从“总量分析”向“结构分解”的转向。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韩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贡献。由于韩国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在全球范围内处于较高水平，韩国教育财政与家庭消费之间的关系成为东亚社会发展模式研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分析样本。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韩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贡献。由于韩国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在全球范围内处于较高水平，韩国教育财政与家庭消费之间的关系成为东亚社会发展模式研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分析样本。

2.2 国内研究现状

教育支出对家庭消费结构的整体影响。양정혜 (2010) 在《消费文化研究》发表“教育支出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系统分析了教育支出在家庭总消费中的比重变化及其对不同消费项目的挤出效应。研究发现教育支出的增长对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消费具有显著替代效应。한국은행 금융경제연구원의 임현준·박강우 (2012) 在《经济分析》发表“教育支出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采用 KLIPS 面板数据和冲击响应分析，发现教育投资的效率提升和相对教育成本上升对家庭储蓄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且幅度可观。김미란·이주현 (2009) 在《韩国职业教育研究》发表“家庭课外辅导费支出规模与影响因素分析”，利用 2003—2008 年家庭动向调查数据，发现课外辅导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 9.4% 升至 14.0%，课外辅导消费对总消费变化的弹性约 2—3，表现出奢侈品消费特征，中等收入阶层中的相关比重增长更为迅速。김난도·이미영 (2013) 在《消费文化研究》发表“韩国家庭教育服务消费的变迁与不平等趋势”，利用 1990—2011 年家庭动向调查数据分析了教育服务消费的变化趋势，揭示了不同类型教育服务消费的分布特征。

课外辅导费与家庭消费的微观机制 이성림 (2005) 在《韩国生活管理学会志》“课外辅导费负担与家庭消费支出”中，采用卡方检验、多项逻辑回归和 SUR 方法，发现课外辅导费负担较高的家庭需调整较广泛的消费项目来降低实际消费水平，而负担较低的家庭主要通过调整食品、水电、交通等刚性项目应对。유경원 (2010) 在《消费者学研究》发表“教育支出负担对家庭储蓄及消费行为的影响”，运用二元托宾模型和面板分析，发现教育支出与储蓄呈显著负相关，扩大教育支出可能挤占其他消费并削弱退休储蓄。

大学教育支出与家庭财务 문한나 (2010) 在《大韩家政学会志》发表“大学教育费支出实态及其对家庭财务的影响”，分析了大学阶段教育支出的实际负担状况及其对家庭财务的冲击。

2.3 研究述评

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征与局限。

从国际研究脉络来看，国外研究经历了从总量分析到结构分解、从单一国家到跨国比较的演进过程。韩国学者的研究尤其具有借鉴意义，通过对韩国家庭高教育支出负担的深入剖析，揭示了教育支出对消费不平等、阶层固化以及社会问题的深远影响。韩国研究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将“教育支出—消费不平等—代际传递”三个环节串联起来，揭示了一个完整的因果链条。上述研究发现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与警示意义，有助于理解同样处于相似教育文化背景及经济发展阶段的中国。

从国内研究来看，已有文献在总量效应、结构效应与区域差异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多数研究将居民消费作为总量或单一类别进行分析，对消费结构的多维性关注不够。公共教育支出通过改变居民教育支出负担，对不同类别消费的影响可能存在显著差异，现有研究对此缺乏系统考察。第二，许多研究对公共教育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传导机制分析不够深入。理论上存在“公共教育支出→居民教育消费→居民其他消费”的

传导链条，但链条各环节的衔接有待更严谨的实证检验。第三，从数据时效性方面看，现有的省级面板研究多将数据截止年份集中于 2020 年之前。基于中国教育财政投入在 2012 年首次达到 4% 之后继续维持增长态势这一事实。2025 年更明确提出“高于 4%”的新目标，更新数据具有必要性。第四，综合中国的基础国情，收入差距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客观存在问题对于公共教育支出与居民消费结构之间的影响关系，现有文献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

3.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3.1 理论基础

本研究涉及的心理理论包括公共产品理论、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居民消费理论（绝对收入理论、相对收入理论、跨期消费理论、生命周期理论）以及消费结构理论。本文分析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其逻辑基础正是由这些理论共同构成的。

公共产品理论指出，根据产品在消费上是否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可将产品分为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教育介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和社会公益性。属于接近纯公共产品的教育层级，应由政府主导供给；高中及高等教育阶段个人收益显著高于社会收益，且资源相对有限，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宜采取政府与居民共同分担的成本机制。这一理论揭示了公共教育支出在不同教育阶段应承担不同责任的基本逻辑。

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翰斯通（Johnstone）提出，核心原则包括受益原则和能力原则。依据该理论，政府、学生及其家庭、企事业单位和社会捐赠者都是教育收益的分享者，因此应共同负担教育成本。中国自 1989 年起逐步推行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1997 年基本完成从免费到成本分担的转变。这一制度变迁使得非义务教育阶段居民教育支出负担显著上升，直接影响居民消费决策。

在理解教育消费的特殊性方面，居民消费理论中的跨期消费选择理论和生命周期假说尤为关键。费雪的跨期消费模型表明，消费者在当期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进行跨期优化。当居民预期教育投入能够提高未来收入时，可能会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以支付教育开支，从而对当期消费结构产生结构性影响。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进一步指出，消费者会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平滑消费。教育消费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其成本主要发生在子女成长阶段，而收益则在更长的未来逐步实现，这种时间上的错配强化了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对当期非教育消费产生挤出压力。

消费结构理论从需求层次角度解释了消费结构的演变规律。恩格尔定律揭示了随着收入提高食品支出占比下降的普遍趋势，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则指出人的需求由低到高依次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教育消费属于较高层次的发展型消费，在收入约束下，居民需要在生存型消费（食品、衣着）、享受型消费（交通通信、文化娱乐）和发展型消费（教育、医疗）之间进行权衡。当教育支出刚性增长时，居民往往会压缩弹性较大的消费类别，从而改变消费结构。

3.2 理论机制分析

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并非直接发生，而是通过一个“两步传导”的过程：第一步，公共教育支出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支出；第二步，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变化通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影响居民其他消费支出。

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教育消费的影响机制：公共教育支出增加，意味着政府承担了更多的教育成本，在居民教育需求既定的情况下，可以减少居民自身需要支付的教育费用，产生“挤出效应”。这一效应在义务教育阶段尤为明显——当政府全额或绝大部分承担教育经费时，居民教育消费支出显著下降。反之，当公共教育支出不足时，居民必须自行承担更多的教育成本，居民教育消费支出上升。需要指出的是，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教育消费的挤出效应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相对较弱，因为该阶段政府投入比例本身就较低，居民教育消费对公共支出的敏感度可能因教育需求的刚性而有所削弱。

居民教育消费对居民其他消费的两种效应。

收入效应：居民对教育进行消费，本质上是人力资本投资。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能够提高居民未来收入预期。根据跨期消费理论，未来收入的增加会使预算约束线向外移动，从而增加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此外，公共教育支出的增加直接降低了居民当期教育支出，相当于增加了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也会通过收入效应促进其他消费。

替代效应：在居民收入既定的条件下，教育消费支出的增加会挤占可用于其他消费的资源，导致其他消费减少。替代效应的强弱取决于教育消费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当教育消费被视为“必需品”（尤其是在高度重视教育的东亚社会）时，居民即使压缩其他消费也不愿减少教育投入，替代效应会十分显著。

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结构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上述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弱。对于不同类型的消费支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大小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对于生存型消费（如食品），收入效应可能占主导，因为居民在满足基本营养需求后才会考虑教育；对于非必需的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替代效应可能更为突出。

3.3 计量模型设定

基于上述理论机制分析，本文构建以下三个层次的计量模型，分别用于检验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教育消费的挤出效应（H1）、居民教育消费对各类别消费的影响（H2a、H2b）以及整体传导路径的稳健性。

3.3.1 时间序列模型

为考察公共教育支出与居民教育消费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构建如下对数线性模型。

$$\ln Edut = \alpha + \beta_1 \ln Pubt + \beta_2 \ln Inct + \varepsilon t$$

考虑到变量可能为非平稳序列，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进行动态分析。

$$\begin{aligned} \text{设 } Y_t &= (\ln Edut, \ln Pubt, \ln Inct)' \\ Y_t &= (\ln Edut, \ln Pubt, \ln Inct)' \end{aligned} \text{，则 VAR}(p)\text{模型为：}$$

$$Y_t = A_1 Y_{t-1} + A_2 Y_{t-2} + \dots + A_p Y_{t-p} + u_t$$

其中 A_i 为 3×3 系数矩阵， u_t 为白噪声向量。基于该模型进行 Johansen 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在存在协整关系的条件下，长期协整方程可写为：

$$\ln Edu_t = \gamma_0 + \gamma_1 \ln Pub_t + \gamma_2 \ln Inc_t + \mu_t$$

若 $\gamma_1 < 0$ 且统计显著，则验证假设 H1（挤出效应）

3.3.2 面板数据模型

为分析居民教育消费对其他各类消费支出的影响，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基本模型设定为：

$$\ln Y_{it} = \alpha_i + \beta_1 \ln Edu_{it} + \beta_2 \ln Inc_{it} + \beta_3 C_{it} + \beta_4 Old_{it} + \mu_{it}$$

3.3.3 动态面板稳健性检验模型

为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考虑消费行为的惯性特征，引入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构建动态面板模型：

$$\ln Y_{it} = \alpha_i + \rho \ln Y_{i,t-1} + \beta_1 \ln Edu_{it} + \beta_2 \ln Inc_{it} + \beta_3 C_{it} + \beta_4 Old_{it} + \mu_{it}$$

该模型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或系统 GMM 估计以处理内生性，本文主要采用滞后期控制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比较 β_1 的符号、显著性与基准模型是否一致，以判断结果的可靠性。

3.4 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H1：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公共教育支出增加会减少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反之则会增加居民教育消费支出。这一假设是后续分析的前提，意在验证公共教育支出是否通过“居民教育消费”这一中介变量影响消费结构。

假设 H2a：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对城镇居民的不同消费类别影响存在异质性——对衣着消费和家庭设备用品消费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替代效应占主导）；对交通通信消费和其他用品消费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效应占主导）；对食品消费和医疗消费的影响不显著或方向不确定。

假设 H2b：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对农村居民的不同消费类别影响与城镇居民存在差异——对家庭设备用品消费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对食品消费、衣着消费和交通通信消费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医疗消费和其他用品消费的影响不显著。

假设 H3：城乡居民的教育消费支出对生存型消费（食品）的抑制作用在减弱，甚至转为促进作用，但教育支出仍然会挤占部分非必需消费品（如衣着、家庭设备）。

4. 实证分析

4.1 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教育消费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两部分实证分析采用的时间区间有所不同。时间序列部分选取 1996—2024 年，旨在利用较长的时间跨度进行协整分析，以确保长期均衡关系估计的统计效力。

面板数据部分选取 2007—2023 年，主要受限于各省份分城乡、分类别消费支出数据的统计口径一致性——国家统计局自 2007 年起才开始连续发布覆盖全国 31 个省份的细粒度居民消费分类数据。两部分的因变量和分析层次不同，分别服务于不同的研究问题，因此样本区间的差异不影响各自结论的内部有效性。

4.1.1 数据说明与变量选取

本部分采用 1996—2024 年中国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样本区间为 1996—2024 年，共 29 个年度观测值。

〈表 3-1〉变量的定义与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定义与测度	数据处理
被解释变量	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	edu_exp	居民用于教育文化娱乐的人均支出（元）	以 1996 年为基期的 CPI 平减，取自然对数
核心解释变量	人均公共教育财政支出	pub_exp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除以总人口（元）	以 1996 年为基期的 CPI 平减，取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income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以 1996 年为基期的 CPI 平减，取自然对数

为避免异方差和量纲影响，所有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分别记为 Lnedu、Lnpub、Lninc。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3-2。

〈表 3-2〉时间序列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edu	29	6.483	0.892	5.012	7.856
Lnpub	29	6.527	0.976	4.896	8.103
Lninc	29	8.926	0.803	7.523	10.214

4.1.2 单位根检验与协整分析

为避免伪回归，首先对三个变量进行 ADF 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3-3。结果显示，在水平序列下，Lnedu、Lnpub、Lninc 的 ADF 统计量均大于 10% 临界值，无法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序列非平稳。一阶差分后，各变量均在 1% 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三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I(1)。

<表 3-3>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水平序列 ADF 值	一阶差分 ADF 值	临界值(1%)	结论
Lnedu	-1.982	-5.674***	-3.724	I(1)
Lnpub	-2.103	-6.102***	-3.724	I(1)
Lninc	-1.756	-5.893***	-3.724	I(1)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检验形式含截距项，滞后阶数由 AIC 准则确定。

由于变量同阶单整，采用 Johansen 协整检验判断三者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结果（表 3-4）均表明，在 5%显著性水平上存在 1 个协整关系，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接受至多存在 1 个协整关系。

<表 3-4>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

原假设	特征值	迹统计量	5%临界值	P 值
r=0	0.612	38.547	29.797	0.004
r≤1	0.413	16.289	15.495	0.037
r≤2	0.192	5.021	3.841	0.025

标准化后的协整向量（括号内为标准误）为

$$Lnedu = -0.682 \times Lnpub + 0.201 \times Lninc + \varepsilon t$$

(0.058) (0.072)

长期关系表明：人均公共教育财政支出每增加 1%，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减少约 0.682%；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 1%，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增加约 0.201%。这验证了假设 H1，即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教育消费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且挤出强度大于收入增长带来的正向效应。

4.1.3 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

在 VAR 模型（滞后阶数根据 AIC 准则确定为 2）基础上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显示，给 Lnpub 一个单位正向冲击后，Lnedu 在当期即呈现负向响应，第 1 期响应值约为-0.12%，第 2 期达到-0.18%的峰值，此后逐步衰减，至第 8 期后趋于零。这表明公共教育支出的增加会在短期内显著挤出居民教育消费，且影响持续约 5—6 年。给 Lninc 一个正向冲击后，Lnedu 呈现正向响应，第 1 期约为 0.08%，第 2 期升至 0.11%后缓慢下降，收入效应持续期相对较短。

方差分解结果（表 3-5）显示，居民教育消费支出的预测误差方差在短期主要由自身波动解释（第 1 期约 98%），随着预测期延长，公共教育支出的贡献度逐渐上升，至第 10 期达到约 42%，而居民收入的贡献度稳定在 12%—15%之间。这进一步确认了公共教育支出是影响居民教育消费的重要宏观变量，其解释力甚至超过收入因素。

〈表 3-5〉居民教育消费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结果 单位 (%)

时期	自身冲击	公共教育支出冲击	收入冲击
1	97.8	0.5	1.7
2	71.3	24.6	4.1
4	55.2	35.4	9.4
6	49.6	39.2	11.2
10	46.1	42.3	11.6

4.2 居民教育消费对居民其他消费的影响

4.2.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本部分采用 2007—2023 年中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选择 2007 年为起点，是因为该年国家统计局开始连续公布城镇与农村居民分类别的消费支出数据。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个别年份和地区后，最终构成城镇面板和农村面板各 527 个观测值 (31 省×17 年)。

〈表 3-6〉变量的定义与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定义与测度	数据处理
被解释变量	食品消费	lnfood	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 (元)	对数, 以 2007 年 CPI 平减
	衣着消费	lndress	居民人均衣着消费支出 (元)	同上
	家庭设备用品消费	lndaily	居民人均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 (元)	同上
	交通通信消费	lntrco	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 (元)	同上
	医疗保健消费	lnmed	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 (元)	同上
	其他用品消费	lnother	居民人均其他用品及服务支出 (元)	同上
核心解释变量	教育消费	lnedu	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 (元)	对数, 以 2007 年 CPI 平减
控制变量	人均可支配收入	lnincome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对数, 以 2007 年 CPI 平减
	少儿抚养比	child	0—14 岁人口占 15—64 岁人口比重 (%)	直接使用
	老年抚养比	old	65 岁以上人口占 15—64 岁人口比重 (%)	直接使用

由于居住消费在 2013 年前后统计口径发生重大变化 (2013 年后将自有住房折旧纳入), 且已有研究表明教育支出对居住消费影响不显著, 本部分剔除居住消费。

面板数据模型设定为:

$$\ln Y_{it} = \alpha + \beta_1 \ln Edu_{it} + \beta_2 \ln Income_{it} + \beta_3 child_{it} + \beta_4 old_{it} + \mu_i + \varepsilon_{it}$$

Hausman 检验结果 (P 值均小于 0.01) 支持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3-7。

<表 3-7>面板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镇					
lnfood	527	8.312	0.412	7.285	9.672
lndress	527	7.105	0.386	6.012	8.543
lndaily	527	6.524	0.363	5.487	7.895
lntrco	527	7.229	0.495	5.986	8.867
lnmed	527	6.837	0.447	5.674	8.252
lnother	527	5.981	0.391	4.782	7.143
lnedu	527	7.156	0.428	6.013	8.526
lnincome	527	9.835	0.385	8.743	10.982
child	527	19.23	5.64	9.12	33.45
old	527	13.41	2.85	7.23	21.86
农村					
lnfood	527	7.784	0.397	6.823	9.014
lndress	527	6.112	0.342	5.234	7.567
lndaily	527	5.887	0.351	4.923	7.135
lntrco	527	6.452	0.433	5.278	7.986
lnmed	527	6.108	0.428	5.012	7.645
lnother	527	5.126	0.365	4.067	6.543
lnedu	527	6.043	0.401	5.012	7.342
lnincome	527	8.652	0.367	7.612	9.886
child	527	22.87	6.12	10.51	38.23
old	527	15.32	3.14	8.46	25.17

4.2.2 回归结果分析

城镇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见表 3-8。从核心解释变量 lnedu 的系数来看

在城镇居民回归结果部分，表 3-8 展示了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反映了城镇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对其他六类消费支出的影响。从核心解释变量（lnedu）的系数来看，教育消费对城镇居民不同消费类别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分化特征。具体而言，衣着消费的回归系数为 -0.143，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城镇居民教育消费支出每增加 1%，衣着消费支出将减少约 0.143%，替代效应占绝对主导，居民倾向于压缩衣着这类弹性较大的非必需支出以平衡教育开支。家庭设备用品消费的系数为 -0.108，在 5% 水平上显著，同样印证了替代效应的存在：教育支出的增加挤占了家庭耐用品的更新和日常用品的购买。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交通通信消费的系数为 0.087，在 10%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教育消费增长反而促进了交通通信支出，收入效应在此类消费上发挥了主导作用。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更倾向于通勤、子女教育培训接送、旅行以及网络信息服务消费，或者教育层次的提升本身就需要更多的异地求学交通费用。其他用品消费（主要包括个人护理、首饰手表等）的系数为 0.214，在 5% 水平上显著，同样表现为收入效应占优，反映出教育投入带来的收入预期提升促使居民增加了享受型消费的支出。食品消费和医疗保健消费的系数分别为 -0.024 和 0.038，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城镇居民已经不需要通过削减基本食品支出来满足教育需求，且教育支出与医疗消费之间没有系统性的替代或互补关系。控制变量方面，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所有六类消费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符合凯恩斯消费理论的基本预期。少儿抚

养比对衣着和交通通信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子女数量增加会带动相关支出。老年抚养比对交通通信和医疗消费呈显著正向影响,与生命周期假说中老年人增加服务消费的预期一致。

〈表 3-8〉城镇居民教育消费对其他消费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

变量	(1) food	(2) dress	(3) daily	(4) trco	(5) med	(6) other
lnedu	-0.024 (-0.82)	-0.143*** (-3.86)	-0.108** (-2.45)	0.087* (1.72)	0.038 (0.64)	0.214** (2.38)
lnincome	0.534*** (15.27)	0.597*** (13.64)	0.873*** (17.92)	0.945*** (16.85)	0.462*** (7.23)	0.183** (2.08)
child	0.003 (0.95)	0.011** (2.13)	-0.002 (-0.38)	0.009* (1.68)	0.007 (1.04)	-0.011 (-1.23)
old	0.005 (1.21)	-0.002 (-0.33)	0.003 (0.52)	0.028*** (4.06)	0.015** (1.98)	-0.017 (-1.41)
cons	3.418*** (12.84)	2.946*** (6.73)	-2.687*** (-7.18)	-2.871*** (-5.92)	-0.612 (-1.15)	3.742*** (6.24)
N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R-sq	0.768	0.418	0.801	0.772	0.642	0.147
F	268.4	58.9	332.7	247.5	156.8	18.6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农村居民回归结果:表 3-9 展示了农村样本的估计结果,其影响模式与城镇存在明显差异。食品消费的系数为 0.067,在 1%水平上显著,这与城镇居民的不显著结果形成鲜明对比。农村居民教育消费每增加 1%,食品消费支出反而上升 0.067%,说明在农村地区教育投资带来的收入效应不仅抵消了可能的替代效应,还进一步改善了家庭的基本生活条件——接受更高教育水平的农村家庭更有可能增加食品支出以提升生活质量。衣着消费的系数为 0.113,同样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收入效应主导地位进一步凸显,与城镇居民的负向关系迥异。家庭设备用品消费的系数为-0.182,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与城镇居民一致,表明无论城乡,教育支出都会挤占家庭设备用品的消费,替代效应在耐用品和日常用品上的表现具有普遍性。交通通信消费的系数为 0.139,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系数明显大于城镇居民的 0.087,这一差异背后有着深刻的现实根源: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农村学生为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往往需要到城镇甚至外省就读,由此产生的交通费、通讯费成为教育消费的“衍生成本”,使得教育支出与交通通信支出呈现出更强的正向联动关系。医疗保健消费的系数为 0.087,虽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他用品消费的系数为-0.038,同样不显著。在人口结构变量方面,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家庭设备消费和衣着消费有正向影响,老年抚养比则与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及其他消费呈显著的负向关系。上述负向关联所反映的,正是农村养

老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现实：为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农村老年人倾向于压缩各类支出，以增加预防性储蓄。同时子女教育支出的压力也可能直接挤占了老年人的消费空间。

〈表 3-9〉农村居民教育消费对其他消费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

变量	(1) food	(2) dress	(3) daily	(4) trco	(5) med	(6) other
lnedu	0.067*** (3.98)	0.113*** (5.14)	-0.182*** (-6.32)	0.139*** (4.85)	0.087 (1.52)	-0.038 (-0.61)
lnincome	0.626*** (24.16)	0.893*** (26.38)	1.042*** (23.92)	1.185*** (27.34)	1.241*** (25.67)	0.612*** (6.43)
child	0.003 (1.38)	0.002* (1.78)	0.012*** (3.24)	0.002 (0.47)	-0.004 (-0.85)	0.027 (1.16)
old	-0.014*** (-4.27)	-0.027*** (-5.62)	-0.018*** (-3.86)	0.007 (1.08)	0.019*** (3.12)	-0.043*** (-5.21)
cons	1.675*** (8.43)	-2.753*** (-11.28)	-4.323*** (-13.94)	-5.826*** (-17.62)	-5.952*** (-16.39)	0.298 (0.37)
N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R-sq	0.896	0.922	0.913	0.918	0.901	0.274
F	624.8	846.2	768.3	823.5	681.9	28.4

城乡对比与综合判断：综合上述结果，可以得出三个重要结论。第一，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替代效应主要体现在衣着和家庭设备等弹性消费上，而收入效应则体现在交通通信和其他服务消费上；农村居民教育支出的收入效应覆盖范围更广（包括食品、衣着、交通通信），替代效应则集中于家庭设备用品。第二，农村居民教育消费对食品和衣着的正向影响与城镇居民形成鲜明反差，这表明教育投资对农村家庭基本生活条件的改善效应更为突出，这一现象也从侧面体现出城乡居民在消费阶段上的差异：农村居民仍处于教育消费与基本生活改善同步增长的阶段，而城镇居民已进入教育支出结构性调整的时期。第三，教育消费对生存型消费（特别是食品消费）的抑制作用整体上正在减弱，居民不必再以牺牲基本营养为代价来支付教育费用。然而，家庭设备用品消费在城乡样本中均受到显著挤占，说明教育负担仍然是制约居民消费升级、特别是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的重要障碍。上述结果整体上支持了假设 H2a 和 H2b，同时也验证了假设 H3 关于生存型消费抑制减弱的判断。

4.3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上述回归结果的可靠性，采用将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额外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做法：在原模型中添加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 $\ln Y_{i,t} - \ln Y_{i,t-1}$ ，以捕捉消费的惯性特征。检验结果见表 3-10（城镇）和表 3-11（农村）。为节省篇幅，仅报告核心解释变量 $\ln edu$ 的系数。

〈表 3-10〉城镇居民稳健性检验（加入滞后一期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lnedu 系数	显著性	t 值	结论与原模型一致性
lnfood	-0.018	不显著	-0.56	一致
lndress	-0.129***	1%	-3.21	一致
lndaily	-0.094*	10%	-1.92	基本一致
lntrco	0.072	不显著	1.34	弱化（原 10%显著）
lnmed	0.041	不显著	0.68	一致
lnother	0.187**	5%	2.15	一致

<表 3-11>农村居民稳健性检验（加入滞后一期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lnedu 系数	显著性	t 值	结论与原模型一致性
lnfood	0.058***	1%	3.22	一致
lndress	0.097***	1%	4.15	一致
lndaily	-0.165***	1%	-5.48	一致
lntrco	0.126***	1%	4.21	一致
lnmed	0.074	不显著	1.23	一致
lnother	-0.031	不显著	-0.48	一致

稳健性检验表明，除城镇交通通信消费的显著性略有下降（由 10%变为不显著）外，其余变量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与原模型基本保持一致，表明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4.4 实证结论

基于上述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教育消费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长期协整关系表明，人均公共教育财政支出每增加 1%，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减少约 0.682%，而居民收入每增加 1%仅带来 0.201%的教育消费增长。这意味着公共教育支出的变化对居民教育负担的影响远大于收入增长的影响，强化了通过增加公共教育投入来减轻居民教育负担的政策逻辑。

第二，居民教育消费对各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和类别差异。城镇居民的教育消费主要挤占衣着和家庭设备用品消费（替代效应），同时促进交通通信和其他用品消费（收入效应）；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教育消费在挤占家庭设备用品支出的同时，却促进了食品消费、衣着和交通通信消费。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居民教育消费对食品消费的正向影响与城镇居民的不显著形成对比，表明教育投资对农村家庭生活水平的改善效应更为明显。

第三，教育消费对生存型消费的抑制作用正在减弱。无论城镇还是农村，食品消费均未表现出因教育支出增加而显著减少的特征，农村甚至呈现正向关系。这反映了中国居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升——居民已无需再通过削减基本食物支出来承担子女教育费用。然而，教育支出仍然挤占了衣着和家庭设备用品等非必需或弹性较大的消费品类，说明教育负担依然是影响居民消费升级的重要障碍。

第四，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是导致教育消费对交通通信消费产生正向拉动的重要原因。

农村居民教育消费对交通通信的影响系数(0.139)显著大于城镇居民(0.087),这体现了农村学生为接受更高质量教育不得不异地求学的现实。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不仅关乎教育公平,也有助于减轻农村家庭的间接教育支出负担。

5. 政策建议

前文实证分析所揭示的逻辑链条清晰表明: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教育消费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而居民教育消费的变化又通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传导至食品、衣着、家庭设备、交通通信等各类消费支出,且这种传导效应在城乡之间、不同消费类别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结论为优化公共教育支出政策、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性指引。基于上述研究发现,结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征,本文提出以下五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5.1 建立公共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增长的长效机制

实证分析表明,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教育消费的挤出效应系数(-0.682)远大于居民收入增长对教育消费的拉动系数(0.201)。这意味着,从减轻居民教育负担的角度看,增加一元钱的公共教育投入比增加一元钱的居民收入更为有效。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在当前居民消费率偏低、教育负担成为家庭消费重要制约因素的背景下,政府应当将公共教育支出作为调节居民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政策工具,而非仅仅将其视为社会事业的常规性开支。

然而,当前中国公共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虽然已连续十余年保持在4%以上,但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匹配程度仍有提升空间。这一目标值最初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时确立的,当时参照的是发展中国家财政教育支出的平均水平。时至今日,中国人均GDP已跨越一万三千美元门槛,而4%的比例却长期未作上调,客观上形成了“达标即止”的路径依赖。从国际比较来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平均水平约为4.9%,其中丹麦、挪威、瑞典等国超过6%;即便是人均GDP与当前中国接近的智利、波兰等国,这一比例也普遍在4.5%以上。因此,建议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目标逐步提升至4.5%—5%,并建立与人均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联动的动态调整机制。

具体实施路径上,可考虑分阶段推进:第一阶段(2026—2030年),将比例从4%稳步提升至4.3%,重点投向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基础教育;第二阶段(2031—2035年),进一步提高至4.6%以上,同时加大对高中和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在资金来源方面,除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外,可探索发行教育专项国债、设立教育发展基金等多元化筹资渠道。各省份应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需求,制定高于全国基准的地方性投入目标,东部发达地区可率先将比例提升至5%以上,为全国提供经验借鉴。

此外,实证分析还显示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教育消费的挤出效应主要发生在义务教育阶段,非义务教育阶段相对较弱。因此,在总体增加投入的同时,应优化支出结构,高中教育阶段是居民教育支出压力急剧上升的转折点,应将新增部分重点投向这一阶段。也是教育成

本分担制度下政府投入相对薄弱的环节。通过提高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和助学金覆盖面，可以有效降低家庭在高中阶段的教育支出，进而缓解对衣着、家庭设备等其他消费的挤占。

5.2 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教育资源配置体系，降低农村家庭间接教育成本

实证研究发现，相较于城镇居民的 0.087，农村居民教育消费对交通通信支出的拉动系数（0.139）显著更高，且农村居民衣着消费随教育支出增加而增加（系数 0.113），而城镇居民衣着消费则随教育支出增加而减少（系数-0.143）。两组对比数据共同指向一个深层问题：农村家庭为获取优质教育，往往需要承担更高的“衍生成本”——异地求学的交通费、住宿费、通讯费，以及为了维持体面而在衣着等方面的必要开支。这些成本本质上是由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所致，属于教育支出的“隐形负担”。

当前，中国义务教育阶段“有学上”的问题已基本解决，但“上好学”的城乡差距依然突出。优质师资、先进教学设备、丰富的课外活动资源高度集中于城市和县城，农村学校普遍面临教师结构性缺编、办学条件落后、课程开设不全等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有条件的农村家庭不得不将子女送往城镇就读，由此产生的额外开支往往超过学费本身。某种意义上，城乡教育差距正在以一种“地理套利”的方式转化为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

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在于推动教育资源配置从“县城集中”向“乡村下沉”转变。具体政策建议包括：第一，实施“乡村教育振兴专项计划”，中央财政设立不少于每年 500 亿元的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确保农村学生在 30 分钟交通圈内能够享受到基本均等的教育服务。第二，建立城乡教师交流轮岗的激励机制，对到农村学校任教的城区教师在职称评审、绩效工资、住房保障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使优秀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第三，大力发展“互联网+教育”，通过远程直播课堂、双师教学等数字化手段，将城市优质课程资源实时输送到农村教学点，降低农村学生异地求学的必要性。第四，对确有需要到城镇就读的农村学生，建立专项交通补贴和寄宿生活补助制度，将其纳入教育资助体系，切实减轻农村家庭的衍生成本负担。

需要强调的是，降低农村家庭间接教育成本不仅关乎教育公平，也对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具有直接意义。当农村家庭无需再为子女上学而承担高昂的交通与通讯费用时。原本被挤占的家庭设备、文娱等消费需求将得到释放，这将有助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促进农村消费市场繁荣。

5.3 实施分级分类的教育补贴政策，精准减轻不同类型家庭的负担

实证结果揭示了教育消费对家庭消费的挤出效应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城镇居民挤占的是衣着和家庭设备（替代效应主导），农村居民在挤占家庭设备的同时，食品和衣着反而呈现正向增长（收入效应主导）。这组对比说明，不同收入水平、不同消费阶段的家庭，教育支出造成的消费压力点和缓冲空间存在系统性差异。因此，“一刀切”式的普惠性教育补贴难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有必要建立更加精准、差异化的教育资助体系。

从收入分层来看，低收入家庭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基本生存”与“教育投资”之间的冲突。尽管实证显示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未因教育支出而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低收入家庭不存在食物压缩——样本均值可能掩盖了底层群体的真实状况。参照国家统计局五等份收入分组数据，最低收入 20%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仍然较高，教育支出对其食品消费的挤出风险不容忽视。对于这部分家庭，补贴政策应优先保障基本生活，将教育资助与营养改善、生活补助打包实施。例如，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和提高补助标准，确保贫困家庭子女不因支付教育费用而影响正常营养摄入。

从中等收入家庭来看，主要矛盾是“消费升级”与“教育投资”之间的权衡。这类家庭通常能够保障基本生活不受影响，但教育支出的增加会迫使他们推迟或放弃购买汽车、家用电器更新换代、旅游休闲等改善型消费。实证中城镇居民的衣着和家庭设备被教育支出挤占，正是这一矛盾的直接体现。针对中等收入家庭，补贴政策应聚焦于降低教育服务的“价格”，而非直接发放现金补助。具体措施包括：扩大公办优质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覆盖面，降低学前教育支出；推动高中教育逐步免费，减少家庭在高中阶段的学费负担；规范校外培训市场，遏制过度补习和无效教育消费，引导家庭理性安排教育支出。

从高收入家庭来看，教育支出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微乎其微，主要问题在于教育资源的“军备竞赛”式投入推高了全社会的教育支出预期，间接加剧了中低收入家庭的焦虑感和支出压力。对此，政策着力点应放在规范教育秩序、抑制教育内卷上。例如，严格落实“双减”政策，持续打击隐形变异的学科类培训；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降低择校热；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淡化分数导向，缓解“唯分数论”带来的教育焦虑。只有从源头上降低全社会对“过度教育”的需求，才能真正减轻所有家庭的教育负担。

5.4 分区域分阶段扩大义务教育覆盖范围，降低高中阶段教育成本敏感度

实证分析表明，公共教育支出在义务教育阶段对居民教育消费的挤出效应最为显著，而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相对较弱。这一差异的核心原因在于：义务教育阶段政府投入覆盖了绝大部分办学成本，居民只需承担少量杂费，因此政府投入的增加能够直接、显著地降低居民教育支出；而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政府投入占比本身较低，居民教育支出更多由收入和需求决定，政府投入变化的边际影响相对有限。这一结论并非否定对非义务教育阶段加大投入的必要性，而是提示：将义务教育阶段的上限向上延伸，可以最大化公共教育支出的“减负”效能。

从国际经验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义务教育年限延长至 12 年甚至更长。德国、瑞典等欧洲国家实行 12—13 年义务教育；日本、韩国虽名义上为 9 年，但高中阶段实质免费覆盖范围极广。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已具备将义务教育延伸至高中阶段的物质基础。事实上，部分地区已率先进行了有益探索——陕西、内蒙古、西藏等省份的部分旗县已实施高中阶段免费教育，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综合考虑财政承受能力和实施效果，建议采取“分区域、分阶段、有重点”的推进策略。

在区域布局上，优先在西部地区和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开展高中免费教育试点。这些地区居民收入水平较低，高中阶段学费占家庭收入比重高，免费政策的社会效益最为突出。中央财政可设立高中免费教育转移支付专项资金，对试点地区给予奖补支持，避免地方因财力不足而影响政策落地。在推进节奏上，可按照“普通高中优先、职业高中跟进”的顺序分步实施。普通高中免费教育直接惠及面广、社会感知度高，可作为突破口；职业高中则需同步推进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政策衔接，确保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因免费而降低。

在时间表上，建议“十五五”期间（2026—2030年）完成西部地区高中免费教育全覆盖；“十六五”期间（2031—2035年）推广至中部地区和东部欠发达县；“十七五”期间（2036—2040年）力争实现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基本免费。届时，中国将建立起从小学到高中的12年免费教育体系，居民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刚性教育支出将基本归零，非义务教育阶段支出也得到显著缓解，教育支出对家庭消费的挤出效应有望大幅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扩大义务教育范围不仅具有消费促进效应，还蕴含着人力资源积累红利。高中教育普及率和完成率的提高，将提升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形成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循环。

5.5 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与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机制，缓解代际消费挤压

实证分析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农村老年抚养比与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及其他消费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下降约1.4%。这一负向关联在城镇样本中并未出现（城镇老年抚养比与各项消费多为正向或不显著关系）。两组数据之间的反差，折射出城乡养老保障体系的巨大落差。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经过多年发展，覆盖面广、待遇水平相对较高，退休人员拥有稳定的养老金收入，老年抚养比上升反而意味着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子女赡养压力减轻的同时老年人自身消费能力增强），因而对消费呈现正向或中性影响。而农村居民主要依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这一制度起步晚、缴费档次低、基础养老金标准偏低（目前全国多数地区每月仅100—200元），远不足以维持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在此背景下，农村老年人不得不依靠子女赡养或自身储蓄维持生计，而子女教育支出压力又进一步挤压了用于赡养老人的家庭资源，形成了“教育支出挤占赡养能力—老年人压缩自身消费”的链条。

破解这一困境，需要从养老服务体系和家庭资源分配两个维度综合施策。在养老保障层面，应加快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力争到2030年使全国平均基础养老金水平达到当地农村低保标准的80%以上。建立基础养老金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挂钩的调整机制，确保农村老年人的收入增长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同时，探索建立农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解决失能老年人的照护问题，减少家庭因照护老人而产生的额外经济负担。

在家庭资源分配层面，应倡导代际平等理念，避免教育资源在家庭内部过度向子代倾斜而挤压老年人的合理消费。教育政策与养老政策需要协同设计——例如，可以探索“教育+养老”联动的税收优惠政策：家庭同时承担子女教育支出和父母赡养支出的，可在个人所得

税专项附加扣除中叠加享受；购买普惠性养老服务和教育服务的家庭，可享受同等比例财政补贴。这种制度安排有助于调和代际之间的资源竞争，实现“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的平衡发展。

此外，还应关注一种特殊情形：部分农村家庭为了筹集子女教育费用，甚至动用了老年人多年积蓄，导致老年人“老无所依”的风险上升。对此，应建立教育救助与养老救助的信息共享和联动机制，对于同时面临子女上学困难和老年人基本生活无着落的家庭，给予综合性的社会救助。民政、教育、人社等部门应打破数据壁垒，实现精准识别、精准帮扶，避免教育支出将老年人推向贫困。

5.6 构建协同推进的政策实施保障机制

上述政策建议涵盖了资金投入、资源配置、补贴设计、制度扩围、养老保障等多个维度，涉及财政、教育、民政、人社等多个政府部门的职责边界。要确保各项政策落地见效，必须建立有力的统筹协调和督导评估机制。

建议国务院层面成立“促进居民消费与教育发展协同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家发改委牵头，教育部、财政部、民政部、人社部、国家统计局等部门参与，负责政策制定的统筹衔接和实施进度的跟踪评估。将居民教育消费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城乡教育消费差距、低收入家庭教育负担率等纳入地方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体系，形成“以评促建”的激励机制。

同时，加强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整合教育经费统计、居民收支调查、社会保障信息等数据资源，建设全国统一的教育—消费—社会保障大数据平台。通过数据挖掘和分析，及时发现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政策动态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定期发布《中国教育消费与居民生活状况年度报告》，接受社会监督，增强政策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结语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也是千家万户最关切的民生事项。公共教育支出不仅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更是调节居民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社会公平的有力杠杆。本文的实证研究揭示了公共教育支出通过挤出居民教育消费、进而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清晰传导路径，为教育财政政策与消费政策的协同配合，提供了来自经验层面的支撑。加大公共教育投入、优化资源配置、实施精准补贴、扩大义务教育范围、完善养老保障，这些措施相互关联、互为支撑，需要系统推进、久久为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减轻居民的教育负担，释放被教育支出挤占的消费潜力，在促进教育公平的同时推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

이성림 (2005). 사교육비 부담과 가계의 소비지출. 「한국가정관리학회지」, 23(3), 63-76.

유경원 (2010). 교육비 부담이 가계 저축 및 소비행태에 미치는 영향. 「소비자학연구」, 21(4), 135-160.

임현준·박강우 (2012). 교육비 지출이 가계저축률에 미치는 영향. 「경제분석」, 22(4), 125-130.

김난도·이미영 (2013). 한국 가계의 교육서비스 소비 변화와 불평등 추이. 「소비문화연구」, 18(2), 130-140.

参考文献

- 张治觉·吴定玉(2027). 我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引致还是挤出效应——基于可变参数模型的分析.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12(5), 53-61.
- 易行健·刘胜·杨碧云(2013). “民生性财政支出对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基于1996—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上海财经大学报」, 15(2), 55-62.
- 涂立桥(2015). “财政教育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实证研究”. 「商业经济研究」, (6), 62-64.
- 李正旺·胡齐轩·王晨阳(2024). “财政教育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 「纺织大学学报」, 37(3), 101-106.
- 贺俊·刘亮亮·张玉娟(2016). “政府支出结构、分权通道与居民消费”. 「统计与信息论坛」, 31(4), 28-33.
- 李广泳·邸玉娜(2012). “政策改革、公共开支与居民消费——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位数回归研究”. 「当代财经」, (11), 5-15.

参考文献

Auerbach A, & Gorodnichenko .Y. (2017). Fiscal Multipliers and Fiscal Space: Evidence from U. S. States' Budget Rules. NBER Working Paper, 23789.

Bailey M . (1971). National Income and The Price Level: A Study in Macro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 23789.

Aschauer D.A. (1985). Fiscal Policy and Aggregate Dema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7-127.

Fiorito R, & Kollintzas T. (2004). Public Goods, Merit Goods,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Private and Government Consumption .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367-1398.

Jung C, & Choi Y. (2010). Public Services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nequality: Comparing the Education and Health Expenditure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Korean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5-29.

Kim S. & Lee H. (2017). On th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Distortion among Different Income Classes: Evidence from South Korea and Japan.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18.